

●朱国华

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特殊形成机理 及其遏制对策

80年代以来，通货膨胀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继1988年发生接近20%的严重通货膨胀后，1993、1994年又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目前，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市场物价在去年上涨13.4%的基础上继续攀升，1—5月份全社会零售物价指数已超过20%，达到了改革开放16年以来的最高峰，通货膨胀已严重威胁着各项改革进程，成为当前经济生活的大敌，已引起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本文试图就日前通货膨胀的特点、形成机理、危害及治理救急措施等，谈几点个人认识。

(一)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现一定的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代价，然而现实存在的通货膨胀已明显超出了正常范围，其主要特点是：

1. 由抑制型转为公开型。1988年过高的通胀，随之而来的三年治理整顿，使价格改革中断，1992年经济开始启动后，迅速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但相应的价格改革滞后，使物价留下较多后遗症，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使能源、交通等基础行业面临窘境，迫使政府不得不于1993、1994年对物价进行大规模调整，使受压抑的通货膨胀公开化，由压力变成了现实。

2. 由温和型发展成为不可容忍型。从历史资料分析及当前我国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看，我国物价指数在4—8%为低度通胀，9—14%为中度可容忍温和型膨胀，15—18%为严重通胀，18%以上为不可容忍型恶性通胀。去年我国全社会零售物价指数为13.4%，属中度可容忍通货膨胀，今年上半年平均零售物价指数已超过26%，已发展成恶性通胀，进入相当严重的程度，达到公众难以容忍的地步。

3. 远超过了经济增长幅度。1979—1992年我国平均经济增长9.3%，年均物价上涨6.4%，通胀率远低于经济增长，1993年通胀率与经济增长率几乎相当，发展到今年上半年，通胀率已远超过了经济增长率，1—5月份全国乡以上工业产值增长19.05%，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2.7%，而城镇居民生活费用物价指数却高达23.7%。

4. 生活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生产资料价格相对稳定。今年以来生产资料价格逐月回落，而消费品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物价上涨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点。工业生产资料1月份增长15.8%、2月份增长10.3%、3月份增长5.2%、4月份增长0.4%，1—4月份平均增长5.8%，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35个百分点，而生活资料特别是副食品、蔬菜和服务价格涨势凶猛，远超过低收入阶层的承受能力，1—5月份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

35个大中城市零售物价指数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0.0%、22.3%和24.6%。

(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实严重通货膨胀是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有其特殊的形成机理：

1. 投资膨胀带来的需求拉动

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幅度高速增长，社会需求十分强劲，有效供给相对不足，以投资为主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发展模式，始终没有得到改变。1991年底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波动后，自上而下的动员，各地恢复性调整和过去10年积蓄增长潜力的加速释放，使近几年的经济增长达到了经济体系所能承受的最高极限。本位主义扩张、利益驱动、追求政绩的腐败风，使各地竞相攀比速度、盲目扩张投资；大量的违章拆借和乱集资为投资超速增长提供了大量资金来源；投资软预算约束使企业数量冲动、囤积倾向和盲目扩张变成了现实。1993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82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6%，是80年代以来最高的一年，年末仅国有单位在建项目未完工程量就达1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60%，今年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数又比上年增长近40%，同时地方新开工项目也较上年同期增长65.2%。

改革16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固定资产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国民经济就会出现失去平衡的紧张状态，上一年的投资过大，必然会对下一年的物价上涨产生强大的推动力。去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为37.72%，今年计划为38%，投资膨胀是通胀形成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1）投资留下硬缺口。一是投资不足，形成半拉子钓鱼工程，被迫追加投资，寻求最小损失；二是形成流动资金的全面紧张，1991年以前国家安排的信贷规模固定资产贷款占15%以下，1992年以后超过了30%，相应挤占了大量的流动资金贷款规模，留下流动资金硬缺口，倒逼中央银行增发基础货币弥补。（2）直接推动了以建材为主的物价上涨，导制进口钢材、原油等大量增加，形成了对外贸易逆差。（3）40%的投资转化为消费基金，直接冲击商品市场。（4）加剧了“瓶颈”约束。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使大量资金流入低水平的一般加工业和各类开发区，使交通、能源等“瓶颈”部门的投资严重不足，引起基础产业资源短缺；一些地方重基建、轻技改倾向严重，使全国技改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逐年下降，1988—1993年依次是35%、31%、28.4%、28.2%、27.7%、26.3%，今年1—5月份已下降为21.8%，形成制约国民经济结构性障碍。

2. 价格改革力度大形成的成本推进

1992年经济发展进入了高速增长期，货币投放、经济发展、职工收入、居民储蓄存款等都大幅度增长，而相应的价格改革严重“滞后”，给1993、1994年的市场物价留下隐患，增加了价改难度。199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物价改革，先是调整了电力、铁路货运价格，放开了大部分粮油、钢铁产品及部分统配煤价格；又调整和提高原木、统配水泥的出厂价格，并对2000万吨原油价格实行“平转议”；今年上半年又提高了棉花、粮、油收购价格，提高了食盐、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等工业品销售价，提高了部分化工、化纤原料出厂价格，逐步理顺了价格关系，改变了基础产业价格长期偏低的状态。

由于能源、原料等初级产品的价格和基础设施的服务收费大幅度提高，使下游产业的利润被重新分配，在既得利益刚性的驱动下，导致物价的全面上涨。1993年全国700种主要工

业生产资料价格有88%的上涨，燃料、动力、能源、原材料平均价格上涨35.1%，导致全年工业品销售成本上升28.5%，出厂价上涨24%。同时，国家基本上放弃了价格管制，到今年6月末，全社会商品零售物价由原97%国家定价，变为95%的全面放开；农副产品收购价由原94.4%国家定价，现90%的放开；生产资料销售原全由国家定价，现88%的放开，市场物价放开幅度太大、速度太快，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超过了居民的货币收入增长和企业的承受能力，加大了人们对通胀的心理预期，带动了物价大幅度全面上升。

3. 信用危机使货币非经济超量发行

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引起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流通中货币的超量发行。1978—1993年，我国GDP实际年均增长9.3%，名义增长15%，流通中的货币年均增长率高达25%，即1993年较1978年实际GDP增长3.8倍，名义GDP增长8.5倍，而流通中货币增长了27.7倍。1993年货币投放量在上年增长36.5%的基础上又较同期增长35.3%（相当于1985—1989五年的总和），高出GDP增长22.3个百分点，今年计划投放量较上年增长30.3%，估计还要突破，高出GDP计划增长21.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与流通中货币增加之间形成的差距，虽包含了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货币化、市场化程度提高，对货币需求增多的正常因素，但如此大的差距所包含的非正常因素也不能不对物价产生强力的推动作用。形成货币非经济超量发行的主要原因是：（1）财政赤字形成的信贷资金财政化。1981—1993年财政向银行透支占市场货币流通量的31%，据有关部门测算，目前财政向银行透支、借款、企业潜亏应补未补、政策性补贴挂帐等已占银行全部资金的30%。（2）信贷平衡缺口形成的金融赤字。我国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专业行靠组织存款和资本金、自身积累以及央行的再贷款，央行靠金融机构准备金、财政性存款和货币发行。从宏观上看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有企业与国家间“父子”关系的软约束，受企业改革滞后的影响，国有企业的市场不适应症明显，出现了大面积亏损，政府为救其于水火，仅1993年9、10月份就增加大中型企业的贷款1500亿元，今年上半年又增加对亏损企业的救急贷款数百亿元。从微观上看，企业多争资金只有好处而不必承担风险，一旦亏损贷款挂帐，企业不致于破产，造成对资金需求的盲目扩张冲动。据有关部门测算，1984年到1993年我国的累计货币发行中有21%的无物资保障，由于流通中货币的大量增加，形成了1988年、1993年和今年上半年的严重通货膨胀。（3）信用危机使信贷资金“存量”病危。由于经济、金融秩序的混乱，银企、银银、企企之间的信用度降到了历史最低度，使目前国家银行向企业的贷款余额中有40%的成为呆帐，给国家留下了农贷、重点建设、大中型企业贷款三个硬缺口。据有关部门测算，目前全国2.6万亿元的信贷资产中，能转得动的仅1/3，2/3的流动资金贷款已不能“流动”，为维持现有企业的正常的铺底资金，保证信贷资金平衡，国家不得不创造增量，发行基础货币。

4. 国民经济畸形增长造成的结构性比例失调

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调整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时至1994年，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反而愈加严重，明显的佐证就是我国基础产业薄弱的状况依然如故。一是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发展比例的失调。1978年开始的改革从放松资金、外汇、原材料管理体制入手，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微观效率，同时也使新增资源流入到原来被压抑的部门，出现了非国有企业与大中型企业争资金、争项目、争原料、争市场的“繁荣”景象。非国有企业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五花八门的偷漏税和地方政府众多的变通措施，

使大量的应缴税款流入预算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工业企业效益却连年下降，70%以上的明亏或暗亏，与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与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强烈反差，以利润留成、利改税、承包责任制到股份制、公司化等管理权力不断下放，亏损面却越来越大，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78%下降到1993年的48%。原因是：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负担，国家拿走了国有企业92%利税，留下8%仅能维持企业的部分经费，丧失了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能力，而非国有企业在工业生产的增加值中占4/5，而税收只占3/10，同时，国有企业还以廉价的原料满足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需求，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每次国家宏观一紧缩见效的首先是国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几乎不受影响。为解决大中型企业的问题，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收缩—扩张—再收缩—再扩张，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信用膨胀。二是工农业发展比例的失调。1984年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镇，从此理论上重视实际上忽视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甚至为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有意或无意削弱和损害了农业的发展。根据历史经验，我国工农业增长速度的比值保持在2.5~3:1较为适度，但1992、1993年却分别高达4.3:1和5.2:1；国家对农业的投入50年代是占投资总额的10%以上，到1993年只占总投资的3%；由于诸多因素，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和城镇居民收入差不断扩大，1989—1993年农民收入年均仅增长2.24%，到1993年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高达2.54:1，已复归到1978年改革初期的不合理水平，比较利益低直接影响了农民种植粮棉的积极性，导致农产品和副食品供不应求，农业已难以支撑高速的工业增长。三是交通运输、能源等基础产业相对滞后，1993年一般工业增长比能源生产增长高24%，比发电量高13%，比货运量高22%，结构明显不协调。重工太重，轻工大发，能源、交通被忽视，造成“瓶颈”因素严重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5. 国民收入超分配形成消费基金膨胀

消费基金膨胀是诱发通货膨胀的直接根源，直接引起了社会购买力的急剧上升，造成了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1989—1993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30%，而城镇人均收入却增长了45%，这种劳动生产率与平均收入的差距，必然造成供求失衡，加大通胀压力，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它在微观经济中的主要表现是：（1）1993年底1994年初政府公务员等工资调整与改革，已经带动和正在带动企事业单位工资水平的攀升，使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货币收入较大幅度增加，1993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21.1%，大大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3%的水平，今年一季度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奖金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8.8%和35%，而国内生产总值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2.7%。工资的大幅度增加一方面使产品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消费需求的增长。（2）大量高收入阶层的产生。据有关部门测算全国15000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中，有30%集中在少部分人身上。由于体制不完善，相当部分人致富不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损害国家利益，想方设法逃避税收，使国家大量应得财政收入转为个人的消费基金来源。（3）工资以外的灰色收入大量增加。（4）集团消费偏轨变形。公有制和企业产权制度不明确，为贪污、腐化现象提供了条件，权力侵蚀利润、化公为私、官办公司在政府职能转换过程中中饱小集体私囊，大肆挥霍。

6. 税制改革加大了企业的成本负担

新税制的实行，直接推动了市场物价水平全方位、大幅度上涨。一是普遍实行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制，部分企业和环节因税负增加而使产品成本上升，虽然从出发点和理论上说

税制改革不会增加企业税负，但由于不同企业税负有增有减，由于价格的刚性，在价格放开和需求旺盛的形势下，税负减轻的企业不会因此而降低产品价格，而税负增加的企业则会千方百计通过涨价来转嫁负担。二是一些企业借税制改革之机，出现较普遍的将价内税作“价外税”，在原价格之外加上增值税率，搭车涨价，牟取暴利；还有的借实行新税制之机，提高折旧率、工资奖金，将固定资产贷款利息打入成本。三是一些地方采取寅吃卯粮的办法，抬高1993年底税收收入基数，使当地财政收入大幅度上涨，减少1994年中央预算收入，直接威逼财政收支的平衡。四是一些地方本来财政就不敷出，实行新税制后中央又切去一大块本应地方留成的企业税收，为增加当地收入，应付工资改革等不断增加的财力负担，不得不在正常的企业税负以外，加码征收。

7. 汇率并轨连动物价上升

汇率并轨，美元对人民币汇价由1:5.8调到1:8.7，使人民币一次性贬值40%。本币汇率的降低，最直接的弊端就是出口商品国内收购价的上扬以及进口商品、半制成品、工业原料价格的上升，导致了输入型和推进型通胀的压力。一是汇率并轨，进口商品主要是生产资料由于财政补贴范围的大幅度压缩，关税也按市场价计征，必然使进口商品或以进口商品为原料的产品成本上升，推动物价上涨。如汇率变动，使进口化肥价大幅度上涨，必然使粮、棉等商品成本和价格上升，从而带动相关以粮棉为原料工业企业的成本上升。二是我国出口商品中80%是初级产品，大部分又是国内紧缺的物资，出口增加会拉动出口商品的价格上涨。三是进口中央用汇由平价转为市场价，使国防等重要商品的进口用汇即使压缩到最低50亿美元以内，按市场价计算也将每年增加财政支出150亿元，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大型成套设备进口、医疗设备、教学仪器等用汇也将增加支出100多亿元。四是增加了外债还本付息负担。目前我国外债余额已高达800多亿美元，大部分是“七五”期间的借款，已陆续进入了偿债高峰期，今年以后每年将有50—60亿美元的外债到期，每年将增加偿债负担100多亿元。五是引进外资需增加大量的人民币配套资金。到今年5月底，我国已批准建立三资企业19.4万家，实际利用外资726亿美元。仅今年上半年就新批三资企业3万多家，实际利用外资近200亿美元，汇率并轨后，国内配套资金按1:1的比例算，就较并轨前增加40%，同时引进外资大量增加（无论是借用外债还是引进外资），除部分设备和原料从国外进口外，绝大部分外资还需要在国内市场寻求相应的物资保证，特别是外资大量投向加工业和第三产业，更加剧了能源、原料、交通、通讯的“瓶颈”约束。

8. 两种经济体制并存使宏观调控乏力

目前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新的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形成，旧体制还在经济生活中起一定作用，由于旧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克服，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和风险制约机制，出现了盲目扩大投资、竞相攀比速度等现象，使金融秩序混乱，乱拆借、乱集资死灰复燃；物价管理混乱，乱涨价，乱收费；法律体系不健全，偷税漏税盛行；流通秩序混乱，中间环节大肆盘剥；土地转让、房地产投机、高利引资形成的泡沫经济以及猖獗的走私活动，使少数人高速暴富，导致了信贷规模、消费需求和货币投放失控。

而现行的宏观调控体制却相对滞后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经过十几年的改革，我国在所有制结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宏观调控的对象、内容、方法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滞后于各项改革过程。如价格放开后，没有相应建立价格的调控体系，对价格垄断、暴利、联手提价、自行加价、乱收费等刺激通胀的

行为缺乏必要的监管措施：紧缩银根，控制规模，实际上控住了效益好的、规范化经营的国有企业正常所需的流动资金，而对非国有企业却无可奈何；面对物价暴涨的紧迫形势，中央银行不但没能相应提高利率，反而推出了新的储蓄计息方法与国际惯例接轨，实际降低了存款利率，导致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滑坡、信贷资金告急，又不得不于1993年5月、7月两次调高储蓄存款利率，但随之又被凶猛的通胀所吞噬，物价上升把调高的利率又远远甩在后面，今年一季度社会零售物价指数、35个大中城市居民生活费用指数分别高于同期一年期定期储蓄9.3个百分点和13.6个百分点。按价值规律的要求，本来紧缺的资金应该价格昂贵，以抑制需求，而负利率的再现，使本来就紧缺的资金更加紧张，与宏观调控背道而驰，加大了居民提前消费的心理预期。

（三）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十分关键的一年，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物价稳定无疑是保证改革与发展顺利进行的基础。要实现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把物价指数控制在10%以内的目标，必须将反通货膨胀作为下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政策的重心。国内外多年的治胀实践表明，仅靠人为压低商品价格的办法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综观我国通胀的成因，主要来自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等多种因素，稳定物价也需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开复方，既要救急，又应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1. 确保货币增量的经济性发行。控制物价的关键是中央银行管好货币发行和全社会货币供应量：一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使货币发行与国民经济正常增长率相适应，不搞超经济发行，这是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措施。综观我国多年货币发行工作实践，货币发行增长率与国民经济发展大体平衡币值则稳定，反之则不稳定，央行要依据市场物价、货币流通、经济增长等变化情况，确定全社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二是控制央行给专行再贷款。去年底专业银行近2.6万亿元的信贷资产中，有9400亿是央行的再贷款，占资产总量的40%，说明专业银行对央行的再贷款有很大的依赖性，同时也为央行控制全社会信贷规模提供了操作基础，目前治胀需严格控制向专业银行的再贷款。三是灵活运用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央行通过抛售大量融资券的办法，强令专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购买，收缩信贷，减少专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向社会的放贷能力，达到吞吐基础货币的作用，其操作依据是货币供应量和商业银行备付金头寸及市场汇率等指标的变化，由总行下达指令。四是三家政策性银行以及各部门办金融机构，必须纳入央行管理范畴，防止新信用膨胀渠道的产生；五是严格执行朱镕基副总理对各级银行的“约法三章”，继续控制贷款规模，严禁人民银行办营利性金融机构和对外投资，制止专业银行自办经营性实体，避免新的内在信贷扩张。

2. 强化政府对市场物价的必要干预。价格放开不是放任自流、撒手不管，对通胀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把必要的宏观调控误认为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需要政府对物价进行经常性的宏观调控与管理，要求有比计划经济时期更高的专业水平和调控艺术。一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粮食风险基金、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和主要商品储备制度，运用经济手段平抑市场物价。二是物价检查监督经常化、制度化。通过物价大检查规范价格行为，打击欺行霸市、行业垄断、欺诈、牟取暴利等不法行为。三是延缓新出台价格改革项目。今年下半年新出台的价改项目，只能分步骤、有准备进行，等条件完全成熟后再付诸实施，尽可能分散调价密度并降低调价力度。四是加快法制建设，完善价格管理制度。认真组织实施国务院最近公布的《关

于商品和服务价格明码标价的规定》，制止价格欺诈，增强市场交易透明度，同时抓紧起草《价格法》，研究制定反垄断、反暴利、反欺诈的法律法规，努力做到依法治价。五是宏观上对米袋子、菜篮子、火炉子在内的数十种民生必需品，为政府公务员和低收入者提供的住房；公共教育、保险、医疗、公共交通等事业性服务价格进行监审，由国家直接控制，实行最高限价、提价申报、收费许可、重要商品储备等措施，通过一定的宏观调控，规范定价行为，将物价控制在消费者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3. 严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物价的涨落，市场供求乃至整个经济运行都同投资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目前通胀的主要成因之一就是经济发展太快形成投资规模过大，导致信贷及货币形势严峻，造成了交通、能源、原料的紧张和价格上扬。因此只有将投资管好，才能抑制过速的需求，稳定市场。一是中央银行必须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继续实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建立固定资产投资约束机制，进一步医治投资饥渴症。由国家开发银行统筹安排国家重点建设、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的贷款规模；国家商业银行对企业的基建、技改贷款不得超计划发放；各金融机构都不得挪用同业拆借资金和流动资金发放固定资产贷款，利用外资搞固定资产投资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从源头控制固定资产贷款规模，将固定资产投资率控制在30%以内。二是将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上来，不能继续走盲目扩大规模的老路。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实行区别对待，扩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加速重点建设的投资进程，保证城市附属设施的资金需求，采取经济、法律、行政的办法，引导资金流向“瓶颈”产业；坚决制止地方走不顾实际争资金、争项目、盲目扩张的老路，克服无责、无险的投资偏好弊端；改革、完善公共投资保障体制和相关法规，严格审批新开工项目，对未经批准、违背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要追究主管单位和各级领导的责任。三是将房地产开发、开发区建设、乡以下办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逐步纳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及贷款计划，国家计委每年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政策的需要，制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由人大监督各部门组织实施。四是整顿在建项目。对一般长线产业已开工的、凡是资金不落实和实物前景不明的项目，要下决心坚决停、缓建，砍掉一大批“钓鱼工程”、“半拉子项目”，能并则并，不能并的转上计划内新项目，优化投资组合。

4. 适当提高现行的存贷款利率。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达1.5万亿元，为稳住这笔存款，并鼓励居民进一步储蓄，急需改变当前的负利率状况。负利率也是投资膨胀、信用膨胀的动因之一，在负利率条件下，谁借款，谁发财，借得多，捞得多，诱使一些人利用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之差搞不正之风，助长寻租动机，成为腐败的温床之一，这样国家也就无法控制投资和信贷规模。针对目前严重通胀的现实，有必要再次适当提高现行的存款利率，用高利率政策抑制居民消费和企业对资金的无限需求，缩小实际已经形成的资金价格双轨制，协调平衡储蓄利率与国债及市场零售物价指数之间的关系，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金融宏观调控和抑制通胀成败的关键。

5. 在改革中调整国民经济内部比例关系。要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内部的比例关系，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一是务必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我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全国轻工业产值的70%以上，市场农产品价格是否合理、稳定，对稳定币值、稳定人心举足轻重。抑制通胀，要求农业和农村经济要有较大的发展，抓好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是治胀的关键性的一着，保持社会稳定首先得保证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的稳定，如果农业出了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必须：（1）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切实措

施，利用自己的优势支持农业，在资金、技术、物资、人才、价格、税收等方面提供最大可能的倾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的综合性生产能力，巩固经济建设大后方的建设。

(2) 有关部门要以大局为主，相对稳定工业品特别是农资的销售价格，禁止在农产品收价调高的同时调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避免工农业产品的轮番涨价，以逐步缩小工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3) 坚定不移地减轻农民负担，凡涉及到农民出钱的问题决不开口子，坚决清理各种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农民负担监督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把关。(4) 抓好菜蓝子和商品粮基地建设，建立国家粮食、油料、蔬菜储备制度。二是要对政府机构改革动大手术，实行精兵简政，改变庞大政府、臃肿的机构给财政带来的沉重负担，如将吃皇粮的1000万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干部减为600万人，就可每年节约近200个亿的财政支出，基本消灭赤字，又可以减少办事拖拉、扯皮等腐败现象。三是五大体制改革要注意调整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按市场规律的要求，使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均衡负担，平等税负，减轻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和信贷的压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明亏的企业进行拍卖；暗亏的企业国有民营、共有民营；对有发展前景的改造成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国有企业改造成市场上有竞争活力的竞争者。四是认真制定并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逐步缓解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严重滞后的局面；加快发展支柱产业，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合理调整对外贸易结构，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使产业布局更趋合理；把握好速度、结构与效益的关系，克服急于求成的做法，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效益的提高上。

6. 适度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幅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价格改革难以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居民收入超常增长，形成物价上涨，导致通胀压力过大，我国目前情况有些类似，必须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一是企业工资基金的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后要低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率；机关、事业单位必须执行国家统一制定的公务员工资和津贴标准，把工资增长水平严控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审计监督等有效措施，坚决制止企事业单位滥发奖金和津贴等现象。二是加强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征收，严厉打击各种偷漏税行为，防止社会上发生各种暴利转化为消费基金的现象，用经济手段调节个人收入的差距。三是各企事业单位必须发扬崇俭尚实、艰苦创业的作风，反铺张浪费，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四是针对目前股市低位徘徊状况，在鼓励大的基金组织入市进行长期投资的同时，调整现有政策，挽回股民信心，以吸引大量的民间游资重新投入股市，压抑、延缓通货膨胀压力。

7. 谨防各项改革走形变样。今年金融、财税、投资、外贸、外汇、企业等各项重大改革已经或即将出台，这些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保证，由于其规模庞大、史无前例，如出现的新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则将会成为引发新的通胀的成因；必须采取大胆而谨慎的方式推进改革。一是对即将出台的改革要做好总体布署，做好认真仔细的准备工作，包括研究修改具体的改革步骤、选择合适的出台时机及相关配套措施等，防止过快过猛，以保证各项改革的有序进行。二是监督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次改革与以往不同，以往是“扩权让利”“给好处”，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都很高，而这次是加强中央调控权为主的制度创新，是对既得利益的调整，各方面对改革的心理预期和实际行为都不同，要及时分析、解决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偏差，制订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避免改革措施杂乱无章而增加机会成本和迭加效应。三是要防范改革措施的转轨变形。防止名义搞市场经济，实际搞计划经济表现的权力和市场经济体现的利益联姻，防止该到位的不到位、不该到位的却到位

的状况。财税体制改革要考虑各种可能妨碍中央财力到位的因素；金融体制改革，要防止可能出现的货币发行失控；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行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投资体制改革要防止投资规模失控。四是各项改革需配套进行，防止顾此失彼。没有相关部门的配套改革，各项改革都不可能向纵深方面发展，如政府干预过多，财政赤字大量存在，央行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很小，加强央行的宏观调控也就无法实现；法制不健全，权力大量侵入市场，市场主体行为扭曲，规范和发展金融市场也是做不到的。

8. 成立专门的反通胀监测机构。政府的职能不仅在于用行政权力去阻挡通胀的祸害，更在于用一套系统的操作手段去监测预知通胀的形成机理和发生机制，用必要的经济手段制止恶性通胀的发生，而不是在价格摩擦、成本上升、通胀恶化时才进一步刺激需求，要彻底遏制通胀，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宏观系统工程，不能采取时松时紧的阶段性办法，除了经济政策的干预外，有必要建立高度权威的监测预警系统。一是转换各级人民银行职能，加强调查统计工作，建设好央行自身的货币政策决策支持系统；二是由央行、计委、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联合成立反通胀组织，对通胀问题进行长期监控，建立相应的监测系统，科学分析市场供求、物价水平、居民收入、储蓄增减等因素的变化情况，及时制定调整治胀战略战术；三是设立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超脱于国务院和人民银行总行，由全国人大直接领导，由央行、财政、物委、经济学专家、企业界代表共同参加，货币政策委员会根据监测机构的依据，参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物价指数、国际收支和货币流通速度等确定全社会货币供应量。

（上接第15页） 以避免内部冲突、模糊不清、变化无常和失去目标；要求决策及操作人员接受专门培训，丰富专门知识，把握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联系，及时解决问题；要求充分协商、严格执行纪律；要求公开化、标准化的操作程序，以公平处理各项矛盾；要求可靠、及时、准确和持久的信息联系和反馈控制。

如果把经济改革的决策和操作视为一个可控制的系统，那么，正确控制的关键，一是观测器（如综合部门、统计部门或科研机构）要正确地反馈关于经济改革运行情况的信息；二是控制机构（如政府）对反馈信息有合理的对照标准，不是听到个别人的“群众反映”或利益阶层的“强烈要求”就盲目撤退；三是控制机构的正确决策。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转取决于采用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最大限度地搜集、传递、加工、变换信息。这里说的信息是指人们可以认识、可以理解、具有一定目的性的信息。经济信息是经济系统运动的形式之一，其客观性、物质性构成了经济系统可以认识和控制的基础。健全经济信息系统是改革战略成功实施的必要条件，这也是“特区人”坚韧不拔推进改革的操作要领。

· 简讯 ·

《财经研究》杂志荣获华东地区优秀期刊提名奖

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从去年四季度以来举行了华东地区优秀期刊评选。经评选，《财经研究》杂志荣获优秀期刊提名奖。

（一丁）